

無聲的中國文化，在香港——自 20 年代至今香港 高等院校開辦中國文化課程發展研究計畫介紹*

In Quest of China: A Research Project on Teaching Chinese Culture in Tertiary Education in Hong Kong, from 1920's to the Present

鄭培凱 (Cheng Pei kei) ** 區志堅 (Au Chikin) ***

—

鴉片戰爭之後，西方思想湧入，導致中國出現「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至 1902 年，晚清廢科舉，立學堂，創學科，使傳統中國學問走向分科及分途，專業學科發展的方向。乃至民國建元，大學學科制度相繼成立，這種新興知識的門類，使學生接受規訓制度，教育形式改變，帶來知識走向專業及獨立的發展。¹然而，知識進入制度化的傳播模式後，籌辦者的辦學理念，往往因入事問題、歷史環境、各人的不同政治理念、在大學制度外的政治及經濟因素，影響了校方實踐辦學的理念，甚至未能實踐辦學的理念，或修改早期的辦學理念。尤在殖民地政府為殖民地籌辦大學學科的發展，這些政府沒有必要籌辦及推動當地文化，大學開辦的學科往往呈現辦學理念與現實衝突，或辦學理念在大學學制上作出調整的情況。從另一方面來看，也因殖民地政府籌辦大學制度，改變了殖民地的學風，直接或間接促成此地的學術、文化教育走上現代化及專業化的發展。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獲大學研究資助局撥款委員會資助，於 2002 年至今，展開名為「無聲中國文化，在

香港：自 20 年代至今香港高等院校開辦中國文化課程發展之研究」計畫，從社會史、文化史、學術史及教育史的互動關係，探討自 20 年代至今，香港在 1997 年以前，被英國人管治的殖民地，籌辦中國文化教育的發展情況，籌辦中國文化教育的辦學理念與學術制度之間的衝突、矛盾及融和的多種方向及不同面貌，突破了典型校史、教育史及泛論文化史的研究模式，並藉研究學科規訓的成立與各人的辦學理念、權力的衝突、政治與社會環境的互動關係、辦學理念與制度互動的情況，以為現今籌辦學科模式發展提供借鑒，並說明香港在英國殖民地政府「重英輕中」的教育政策下，「素不重視的」中國文化教育是怎样發展及其所遇的困難。²

研究香港史的學者素來忽視香港學術文化史的研究領域。香港位於中國南端，自唐以還，已成為中國大陸海舶通往海外必經的地方，隨移民日多，中國文化漸漸植根香港；鴉片戰爭以後，香港被中國割予英國，成為英國殖民地，因地理上背向大陸，面向世界，漸漸成為海外西教士及商旅來華的踏腳石，欲了解中國先登香港；也因香港被英國管治，使香港成為中國最先吸收西學的地方，香港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橋樑。因香港扮演了中、英交往的中介角色，區內學術文化、政治經濟及

* 本文是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In Quest of China: Teaching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Hong Kong Universities, 1926 to the Present」研究計畫的一部分，承蒙大學研究資助局(Research Grants Council)的資助，特此致謝。

** 鄭培凱，現為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

*** 區志堅，現任職於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

1 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一書；汪榮祖，〈五四與民國史學之發展〉，載氏編，《五四運動研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頁 221-223。

2 有關英國政府對殖民地推行以英語為主的教育及管治的政策，見 Cohn Bernard, *Colonialism and Its Forms of Knowledge*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3-53.

社會民生均受到英國對華政策，國內的政治及社會文化的變動所影響，若研究香港史，必要從中、英與香港在各方面的互動關係，進行探討。

香港高等院校開辦有關中國文化的課程，主要由各大學的中文系、歷史系、藝術系、宗教系、哲學系、語文教學中心、通識學部、人文學部等開辦有關的中國歷史、中國語文、中國文學、中國哲學、中國藝術等，凡教導有關中國傳統學問的科目，因學科進入大學學制，使中國文化教育朝向制度化的發展，並融合教學及研究的功用，由是專門教導學生中國文化的知識，及培養學生從事研究中國文化的興趣。而且，在大學內修讀有關中國文化課程的畢業生，日後有機會從事教學及研究有關中國文化的工作，這樣可以培育新一代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使中國文化知識廣披民間，又可使中國文化的教研工作薪火相傳，也因香江為中外文化交流的要地，學者具有國學及西學的治學特點，更能闡發中國文化的精義。但昔日學者每多注意個別高等院校校史的研究，卻未注意本港高等院校在推動中國文化教育的努力。最重要者，學者尚未多注意香港各大學，是有異於中國國內各大學的學習環境及學風。香港處於華洋雜處及中、英兩國之間，高等院校開辦中國文化課程，受中、英兩地政治、經濟及學術文化的影響，而香港自 1842 年至 1997 年為英國殖民地，其間以英語為官方法定的語言，香港大學（以下簡稱港大）自 1911 年在法律上承認其已成立，為本港第一所官辦的高等學府，其中教導中國文化專科知識的中文學院（Chinese Studies，日後的中文系的前身），在 1928 年才成立，我們要問為何英國人以外來者的身分，管理這塊以華籍居民為主的地方，卻距港大成立十七年後，才成立這門以高等院校為培養中國文化教育的學科？細探之下，中文學院的成立背景乃受中、英之間，社會、政治因素所影響。至 1963 年，結合新亞、崇基、聯合三所院校而創辦的香港中文大學（以下簡稱中大），終於成立。這所大學是香港第二所官辦大學，也標舉以認同及宏揚中國文化為主的大學，中大開辦有關通識及中國文化的課程（包括：中文系、歷史系、宗教系、哲學系及藝術系等），與港大中文系一樣，均注意培養學生從事中國文化的研究及傳播中國文化的知識。中大成立後，不獨普及大學教育，也積極推動香港中國文化教育，而港大中文系在戰後系主任林仰山（Frederick Segquier Drake）及羅香林等諸賢的開拓

下，中國文化的課程更豐富，兩所大學學者的努力，使香港高等院校推動中國文化教育，大放異彩。還有，自中大成立後，其間課程增刪，教員的去留及政治、經濟環境、教育政策，與中大開辦中國文化課程甚有關係。

早於宋代，香港新界已有自北方遷來的學者，與當地的士紳開辦私塾、書院及學舍，較著名的有錦田的力瀛書院。清代更有錦田的周王二公書院、大埔的敬羅家塾、上水的廖公家塾、沙頭角的鏡蓉書屋、新田的麟峰文公祠、屏山觀廷書室及五桂書室、龍躍頭善述書室等，教導中國傳統四書五經的知識，及至鴉片戰爭，值中國內陸戰亂，香港在英人管治下相對較安定，再一次成為北方學者及士紳南下的避居地，隨他們南下，也帶動中國文化南移，更有不少民間籌辦的私塾相繼自傳統文化影響甚深的新界，發展至香港島及九龍半島，而外人籌理的教會學校，也開辦有關中國文化知識的課程，但多為外籍商人及傳教士教導應用中文的基礎知識，也為本地華人子弟教導中文識字班，如馬禮遜書塾（即日後的馬禮遜書院）及中央書院，其他的華人團體也辦義學，開辦有關中文知識的基礎課程，尤以東華醫院文武義學、孔聖會的鑄伯義學、葆葵義學、陳子褒辦子褒學塾、盧湘父辦湘父學塾及學海書樓，均教導傳統經史及孔子學說，然而尚未有一套有系統的培訓課程，更未傳授有關研究中國文化知識的方法；乃至港大成立，始為高等院校開辦一套有系統的、有規訓知識培訓工作，但設立港大的目的只為「對中國深切了解」、「加強大英帝國與中國的關係」和「溝通東西方文化」，漢文部主要教導外籍人士與華人溝通的技巧及日常用語，屬於應用中文（Practical Chinese）的科目。1928 年，港大中文學院在華商鄧志昂、馮平山及東南亞華僑的資助下，才能成立，並聘請前清太史賴際熙、區大典等任經史講師，賴氏更成為第一屆中文學院主任（即現今的系主任），而中文學院的成立也代表了香港高等院校中國文化教育的先聲；1935 年，港大以名譽法學博士學位贈授中國名學者胡適，欲請他代擬革新中文學院課程的計畫，並欲請他介紹兩位中國學者在中文系任教，初時為陳寅恪，後為許地山。自 1935 年後，賴、區兩位太史相繼退休，許氏任革新後的中文系系主任，他把中文系課程分為中國文學、中國史學、中國哲學的科目，並自 1936 年聘請馬鑑為專任講師，1941 年更聘請國學大師陳寅恪任教其中，1941 年許地山病逝，陳氏也於 1942 年 5

月離港，期間香港淪陷，高等院校中國文化教育停頓，又在 1940 年，中國大陸爆發中日戰爭，國內文物自廣東南下，存於港大馮平山圖書館，又舉辦「廣東文物展覽會」，刊行《廣東文物》三巨冊，會後不少明清翰墨及著作存於香江，這些著作成為日後港大中文系師生研究明清史的重要文化資本。

抗戰勝利後，外籍學者林仰山任中文系主任，推動港大考古學的發展，另一位教員羅香林，早已譽滿中外士林，戰後與臺灣史學界交往甚密，藉他的學術地位及人際網絡，先後籌辦多次國際漢學研討會，又與海外學者接觸，帶動師淑弟子的研究方向，中國文化教育在港大再次重光以後，得以復興，又因為 50 年代，香港與大陸相鄰，中國處於被列強圍繞的特殊環境，香港成為繼臺灣之後，海外西方學者前往探討中國學問的最後關道，他們也欲藉登臨香港了解中國歷史及當代政治及經濟的情況，故在羅香林及林仰山的努力下，港大的中文系及馮平山圖書館成為海外學人必經之地，也成為中外文化交往的橋樑。

另外，50 年代大陸政權易手，很多學者自北方南登香江，他們既不欲遷往臺灣，更不欲留在中國大陸，只好暫居英人管治下的香港，這些自北方南下的學者及群眾，帶動香港人口上升，更導致青少年學生數目遽增，但或因家境困難，或英文程度未及，故未能把適齡女子送上港大。有些南來的學者，早已揚名於中國大陸，他們南下，為未能進入港大就學的青年，得以繼續學業，也可在香港教學，續傳文化的絃音，故這些學人多在香港、九龍二地，開辦「難民學校」或「流亡書院」，又或受到海外教會團體資助開辦了不少私立大專院校，計有香江書院、華僑工商書院、中華文化書院、珠海書院、廣大書院、光夏書院、香港華商追商業專科學校、遠東書院、新亞研究所、崇基書院、聯合書院、浸會學院、文化學院、中國音樂專科學校等，較具規模的，要算是新亞、聯合、崇基、珠海、浸會，這五所書院。除了開辦西方科學、商業課程外，因得南來國學知識豐厚的學者幫助，開辦了有關中國歷史、中國哲學、中國藝術的科目。他們開辦課程，固然以傳播中外文化知識為己任，更重要的是「續存中國傳統文化於海濱」。1956 年九龍發生了華人的暴動，在海外華僑辦的大學對新加坡政府又造成很大困擾，不少僑生也返港，加上香港人口激增，漸漸造成香港大學無法承受的壓

力，而英國方面，也因戰後英國殖民地政府開始修改尊重殖民地民衆的政策，新亞、聯合、崇基三間專上院校分別得到美國基金會的資助，對英國政府而言，視為危害英國在香港管治的威信；也因 50 年代香港私立大專院校林立，各自規劃課程，不少教導以國民政府為代表的政治思想，使港英不得不推行新的教育政策，以控制各私立大專院校的教學內容。英國高等教育委員會主席富爾敦（Sir John Fulton），提交《香港專上學院發展報告書》（*The Development of Post-Secondary Colleges in Hong Kong*）肯定將來成立新大學以中文為授課語言，並於 1963 年提出《富爾敦報告書》（*The Fulton Report*），確立以新亞、崇基、聯合三所書院為首的中大成立之藍圖，但進入統一學制後的中大，昔日三所書院開辦的科目也作調整，三間院校的辦學精神作進一步開拓及實踐，而中大的成立，不僅是打破殖民地只設一所大學的老傳統，更因此大學以當地語言——中文——授課，這也是打破殖民地政府官辦大學只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慣例，更破壞了港英政府對華人採用「分而治之」，不直接介入華人民間社會的基本政策。其後，在 1966 年成立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更在新亞書院辦新亞研究所的基礎上發展出來；1967 年建立中國文化研究所，其下設多所研究中國學問的研究組，踏入 90 年代，更成立逸夫書院。更重要的是，在進入統一學制後的中大，於 60 年代中葉，曾進行統一三所院校的學制，期間三所書院開辦學科也因學制統一化，而進一步調整。就此可見，中大的出現及學科的發展，不僅是代表了香港中國文化教育的新里程碑，更重要的是，中大的成立，與二次大戰後的社會經濟民生，港英政府對華政策甚有關係，有關科目的調整，或可見藉學科實踐辦學理念，或藉辦學科目，以見辦學理念與現實之間的衝突。

故本研究計畫主要探討自港大中文學院成立至今，香港高等院校開辦中國文化課程的孕育、成長及發展，與其時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互動關係，從內部的社會、政治發展，中央政策的施行，結合外在中、英兩國的政治及文化背景，得知香港高等院校推動中國文化教育，在大學教育發展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進一步，本研究不僅可知現代中國高等院校開辦中國文化課程的轉變情況，更從另一方面得見香港教育史被遺忘的一頁。

總之，本研究集中以下三個重點：一、從大學開辦有關中國文化課程的發展，看高等院校開辦的有關科

目，與增加港人對中國文化認同的關係；二、香港及中英兩地的社會及政治因素，與開辦中國文化科目的關係；三、從知識及學術資源競爭的層面，分析 20 世紀高等院校開辦的中國文化課程，在每個階段的發展及特色。最重要者，是本研究藉檢討過去開辦中國文化課程的得失後，可助思考 21 世紀，香港既成為國際大都市，高等學府在推動中國文化教育上扮演的角色，及提供未來高等院校推動中國文化教育的方向。

既然香港高等院校中國文化教育甚值得研究，但前人卻忽視了此研究領域。依近人李培德統計百年來以中文發表，香港史研究的書籍，計有 1,525 種，研究香港教育的有 139 種，研究香港文化的有 250 種，而研究香港經濟的有 277 種，研究香港政法外交的有 146 種。研究香港文化的成果，雖僅次於研究經濟史，要注意的是，這些研究成果多從社會學的現象，探討當代社會文化，對香港學術文化史的研究成果根本不足。而以英文發表，研究香港史的專著書籍，過去百年以還，共有 1,219 種，其中研究香港政法外交的有 186 種，研究香港社會的有 195 種，研究香港經濟的有 166 種，而研究香港教育的有 87 種，研究香港文化的有 121 種，也可見香港教育及文化史的研究領域，不僅甚感不足，更如李氏指出文化思想史的研究領域「差不多還未正式開始」，³若結合學術史、文化史、教育史及政治史的多元學科進行研究，更為少見。

二

雖說運用本研究計畫的方法，進行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見；但近年學者研究香港教育史的成果，甚值得參考。在二次大戰之後，地方史漸受學界注意，只是前人較少注意香港高等院校中國文化教育的研究。

羅香林為研究香港史的專家學者，60 年代因其在港大中文系任教，已注意港大中文系的發展及此系在傳

播中國文化知識上扮演的角色。他在《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學社，1961）一書，注意中文學院自 1928 年至 1960 年代的發展，也介紹賴際熙、區大典等人對香港中文教育的推動；又羅氏任教港大中文系期間，得天時地利，已注意介紹許地山、賀光中、馬鑑、林仰山及饒宗頤等學者對二次大戰前後，確立港大中國文化教育制度發展的貢獻。他更先後為賴氏編刊《荔埏文存》（香港：學海書樓，1974；2000），使這位港大中文學院第一任主任的事蹟及其與東南亞華僑的交往情況，公諸於世；又為林仰山整理《林仰山文存》及撰寫文稿，從高等教育史及考古學的角度，肯定這位外籍教員對本港考古學發展的貢獻。

吳倫霓霞從社會、文化及政治發展的角度，探討香港教育政策、學校制度與教育發展的關係，她從社團組織、結合報章資料，分析民間的反應如何影響教育政策；及後更把博士論文擴充而成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Development of Public Educ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4) 一書。她已注意 20 世紀教育政策及課程的演變與中國文化教育、西方知識傳播的關係，注意民間辦學的情況。其後，她與鄭赤琰撰〈香港華文教育發展與中國的關係〉一文，介紹兩次大戰期間香港華文教育的情況，研究私塾教育演變至新式學制的發展和課程內容，從中英政治及教育政策互動關係，進行探討，得見港大中文系成立的時代背景。日後，她更負責編寫中大校史及聯合書院院史的工作，先後編成《邁進中的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三十年：1963-1993》（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明德新民：聯合書院四十年 1956-1996》（香港：聯合書院，1996），注意聯合書院加入中大前後的發展歷程。近日，倫氏完成〈教育的回顧（上篇）〉一文，也有談及港大中文學院有賴金文泰、晚清遺老的努力。⁴

陸鴻基《香港戰後的教育統計圖表》（香港：華風

3 見李培德，《香港史研究書目題解》（香港：三聯書店，2001），頁 13-30。

4 參吳倫霓霞，〈教育的回顧（上篇）〉，載王賡武編，《香港史新編》（香港：三聯書店，1997），下冊，頁 449-455；黃文江、劉義章，〈香港史開拓者：吳倫霓霞的教研工作〉，載氏合編，《香港社會與文化史論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2002），頁 186-193。倫氏對香港鄉土中國文化教育甚有研究，如“The Role of Hong Kong Educated Chinese in the Shaping of Modern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1983), pp.137-163; “Village Education in the New Territories Region under

書局，1983）、〈盧湘父先生之生平及其事業〉、〈1930年代香港教育概觀〉、〈戰前香港市區私塾教育的一環〉及 *Chinese Culture in the Hong Kong Curriculum: Heritage and Colonialism*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Nov. (1991))，⁵ 前書介紹二次大戰後，統計香港高等院校、中小學學生及開辦科目的統計數字，後者多篇論文均介紹 30 年代民間辦學團體的發展及其推動香港中國文化教育的貢獻。

Anthony Sweeting 以 *The Re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in Post-War Hong Kong, 1945-1954* 為題的博士論文，其後擴充而成 *A Phoenix Transform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in Post-War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一書，他所編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1841-1941: Facts & Opin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0) 資料集，均成為研究香港中國文化教育的重要參考資料，尤以前者，更從中英政治歷史環境，探討中文教育及西方教育在香港發展的情況，但尚未集中討論高等院校推動中國文化教育的特點。⁶

王齊樂歷任官校校長，自然甚為了解香港教育的發展。他的《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店，1996）為香港第一本系統地研究自晚清至 1941 年香港民間及高等院校中文教育發展的專著，此書除了介紹宋代以還香江民間私塾的辦學情況，湘父學院、孔聖會教導四書童蒙知識的問題，更已注意英國總督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華商馮平山、晚清遺老與港大中文學院發展的關係，只是尚未注意晚清遺老、金文泰和華商等人構思中文學院的辦學理念是相同的，也未詳述中文學院的成立與中英官方政治取向的關係。

在前輩學者指導下，他們的學生先後完成有關研究香港中文教育，或中國文化教育發展的博士及碩士論

文。梁偉明在中文大學完成的「香港中文中學發展的困難」（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部，1995 碩士論文）一文主要從：1946 至 1954 年的香港政治探索期，1955 至 1965 年的經濟需求促變期，1966 至 1967 年的學術目標轉向期，1976 至 1982 年的新生角色醞釀期，探討香港中文中學在政治及國際氣氛下發展的情況，並指出港英政府在教育政策上根本沒有多注意中文中學的發展，此帶出了港英政府根本忽視推動本地中文教育。溫婉明「從比較教育觀點看晚清以降中學語文教材之沿革——戰後香港中學語文教材研究」（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碩士論文，1987）注意二次大戰後至 80 年代，香港中國語文教育政策及課文的選編，往往受到政府的政治態度的影響，而且選文的態度也較保守。方伯超「香港第一次中文運動」（香港珠海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指出香港在 70 年代出現的中文運動，主要是港英政府歧視中文在教育和政治的地位，及 1967 年暴動事件和學生運動所致，並指出香江出現的中文運動是香港華人的一項自發社會運動，未受到兩岸政府鼓勵，結論是中文運動不是一個簡單的教育問題，而是香港人自我認同文化的表現。周正偉在「香港專上僑校的發展及式微（1950-1993）」（香港珠海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一文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私立大專院校均以中文為主要教學媒介，一方面多注意教導中國文化知識，以傳承中國文化為己任，一方面又以「反共」的意識相標示，這些「專上僑校」成為推動本地中文教育的重要媒介，而此又與 50、60 年代，香港的人口上升，政治環境甚有關係。文中也先後介紹香港出現的私立大專院校的情況，資料頗豐富。

以校史形式介紹的作品計有：Hornell William Woodward 的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ts Origin and Growth* (Hong Kong Te Olde Printerie, Ltd.)，Drake

the Ching,” in Alan Birch et al. eds., *From Village to City: Studies in the Traditional Roots of Hong Kong Society*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1984), pp.106-118；與王爾敏，〈儒學世俗化及其對民間風教之浸濡——香港處士翁仕朝生平志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8 期（1989），頁 169-186。

5 陸鴻基，〈盧湘父先生之生平及其事業〉，《孔道專刊》7 期（1983），頁 31-35；〈1930 年代香港教育概觀〉，載《兩次大戰期間之海外華人》（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1989），頁 187-199；〈戰前香港市區私塾教育的一環〉，《教育學報》10 卷 2 期（1982），頁 1-8。

6 另參 Anthony Sweeting, “Hong Kong Education within Historical Processes,” Gerard A. Postiglione ed.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3-39. 均從社會史、政治背景的角度概論香港教育的發展。

Frederick, "Chinese And Oriental Studies" (載 Harrison Brian ed.,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First 50 Years 1911-196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2)), Bernard Mellor 編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 Informal Histo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0), 呂潤鴻編《港大六十六年(前瞻與回顧)》(香港:香港大學學生會, 1977), 為慶祝港大成立九十週年, 林奕英等編《學府時光: 香港大學的歷史面貌》(香港: 香港大學出版社, 2001), 至於中大方面也有中大學生會編《中大二十年》(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1984), 前述倫氏編寫的中大校史一書外, 也有陳方正主編《與中大一同成長》(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0), 吳梓明的《五十年來崇基學院的基督教教育》(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 2001), 均屬於校史式的撰述, 也為是次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 另外, Nancy E. Chapman, *The Yale - China Association: A Centennial Histor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1) 已注意美國雅禮會 (Yale-China Association) 資助成立新亞的情況。劉巍〈從新亞書院看錢穆先生的教育思想〉(《中國書院》(湖南: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7)) 已注意新亞書院的辦學理念。至於其他的資料集方面有 Gillian Bickley 編的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1841-1897* (Hong Kong: The Local Printing Press, 2002) 收集了香港政府在 19 世紀對全港的辦學情況、辦學內容的統計資料及官方的教育報告文件, 可以幫助了解香港私塾推動中國文化教育知識的情況。

至於方美賢的《香港早期教育史》(香港: 中國學社, 1975) 一書雖是泛論香港自 1842 年至 1941 年香港教育的發展, 其中也有談及香港中文教育家陳子褒及港大對中西文化教育的推進情況。John Keswick, *Higher Educa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52) 及 Mark Bray 的 "Hong Kong Education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The Impact of External Forces" Gerard A. Postiglione ed.,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3-39.), 丁新豹編《香港教育發展百年樹人》(香港: 市政局, 1993), 均從宏觀的角度研究香港教育的發展, 已注意英國官員、英政府教育政策與國際政治氣候, 對香港教育發展的影響, 當然擬題所限, 未專注研究香港中文教育史, 也可能因一些西方學者因中文語文能力所限, 未閱讀中文的資料, 致研究尚未完備。⁷

近年由陳劉潔貞與 Peter Cunich 編 *An Impossible Dream*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一書內收錄不同學者從社會史、文化史及學術史的角度, 撰寫有關香港大學自 1910 至 1950 的發展, 其中以 C. Mary Turnbull 寫的 "The Malayan Connection" 及 Anthony Sweeting 的 "The University by Report" 二文, 分別探討港大成立之初, 港英政府對中文教育不關心, 致使賴際熙等人並得華商及海外華僑的資助, 港大中文學院的成立與海外華僑甚有關係, 文中也談及 1926 及 1931 年港大中文教育特別課程委員會 (The Special Committee o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推動中文學院課程的目的, 尤注意介紹許地山推動中文教育的改革情況。⁸

此外, 也有不少學者發表專文論及中文學院推動中國文化教育的發展情形。李廣健〈鉅觀與微觀因素對早期香港大學中文教學的影響 (1912-1935)〉(《臺南師院學報》27 期 (1994)), 利用檔案資料, 注意社會、學校、港英政府的因素, 怎樣影響香港推行中國語文教育的政策。作者也強調文化政策的客觀環境, 與教育者內在主觀意志的互動作用, 自中文學院成立至 1935 年許地山推動中文學院的改革, 看來是教育政策的調整, 內裏卻是港、英及中國政府的國際政策、地區情況及人事變動, 而得出的成果。程美寶〈庚子賠款與香港大學的中文教育——2、30 年代香港與中英關係的一個側面〉(《中山大學學報》6 期 (1998)) 一文運用了大量英國牛津大學諾氏藏館金文泰檔案 (Clementi Files,

7 也有黃慶萱, 〈中文系課程在香港〉, 《文訊》20 期 (1985), 頁 123-125; 溫婉明, 〈中國語文科範文的昔日中國形象〉,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報》17 卷 1 期 (1989), 頁 29-35, 均從當代中文教育的立場, 論述香港中文教育的問題, 與本文題旨尚未有直接關連, 故未能介紹其要旨。

8 詳見 Chan Lau Kit-ching and Peter Cunich ed., *An Impossible Dream*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一書內的論文。

Rhodes House's Collection, Oxford University) 注意 1925 年英國國會宣布把中國尚欠英國的庚子賠款運用在發展中國教育，其時金文泰向英國提出發還部分庚款，以便發展港大中文教育，並認為中文學院的成立乃是廣東省政府、香港政府緊張關係下，港英政府為打擊廣州國民政府的籌碼。

趙令揚〈從陳寅恪學術研討會談起〉（載胡守為編《陳寅恪與 20 世紀中國學術》（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0））、〈羅香林教授〉（《聯大歷史學刊》，1 期（1998））、〈儒學與香港專上教育關係之今昔〉（載杜維明《儒學發展的宏觀透視》（臺北：正中書局，1997））。這些文章介紹了陳氏任教港大期間，其時學生金應熙聽陳寅恪及許地山授課，開拓了研究邊疆史地的興趣；趙氏也注意羅香林治唐史、民族史等課題的特色，又述及羅氏對香港史學界的影響；文中也介紹港大及中大在 1997 年前後怎樣推動中國文化教育。Chan Kam Ngan, "The Two Universities in Hong Kong: An Analysis of Their Aims and Contributions to Our Bi-Cultural Community," (*Journal of Education*, No.23 (1966)) 一文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港大及中大的辦學理念及其辦學的困難，其探討中大辦學的情況甚為可取，但尚未注意殖民地時期港大推動中文教育的困難地方。

因為前人對香港中文教育的研究尚感不足，不是偏重泛論或以校史的形式作介紹，就是因選題規範未能就各方面的研究領域，探討自 1928 年中文學院成立至今，香港高等院校推動中國文化教育的情況，故我們展開是次研究計畫。

三

本研究計畫運用的資料甚豐，除了在香港及海內外各大學圖書館、研究所及檔案處，查閱有關文獻和檔案外，研究人員也往英國牛津大學及倫敦大學找尋有關資料，更因本研究計畫主要探討港大、中大推動中國文化教育課程的特色，及其與時代的關係，而 50、60 年代兩所大學的發展，距今未遠，很多在其時執教中國文化科目的學者，或修讀有關科目的學生，至今仍有任教香港各大學，也有已退休的學者，他們的經歷及回憶，均可引證文獻，故本研究計畫，也進行口述歷史，全面探討研究課題。

研究計畫各位成員已就以下課題作出專門討論，先後完成有關章節，並加以發表：

研究人員利用港大孔安道圖書館香港史資料室內的殖民地部檔 129 號 (Colonial Office 129, 簡稱 CO 129)，及從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 Rhodes House 藏的金文泰檔案、香港中華總商會藏中華總商會值理及會議資料，可見 1928 年中文學院的成立，一方面如前人所言，乃是港英政府、國民政府的政策及整個歷史環境迫出來的結果，中文學院既成立在省港大罷工之後，港英政府也欲藉振興傳統中國文化知識，以控制民間；另一方面，我們翻閱以上檔案，可見中文學院的成立，與華商鄧志昂、馮平山的辦學理念相迎合，我們也找到資料，得知賴際熙、區大典所以在這塊殖民地的香江，從事教育事業，不獨只為口腹之欲，更重要的是他們有一套存鄒魯於海奔，保存中國文化的辦學理念；同時，我們也看見中文學院的成立也受英國商人資助。因為省港大罷工後，英商在中國的貿易受到打擊，美國及日本商人得以相繼擴展對華貿易；反之，英國因廣東及香港工人反英的罷工，影響了英國對華貿易，英商認為只有資助港大發展中國文化或中國語文教育，以便更多英人就讀，才可以增加對華的了解，可以減少彼此之間的衝突。我們也翻閱其時的《華僑日報》等資料，可見華商與港督均不滿大陸在五四運動以後出現的「共產思想」；加之，華商在省港大罷工後，地位不斷提升，他們的建議多為政府所採納，在各方面的努力下，中文學院的成立實是華商、英商、港英政府及遺老們合作的成果，故我們不可片面地論及中文學院的成立為港英政府的政治考慮。此篇論文已在 2002 年 5 月間於香港科技大學漢語學系與昆明大學漢語學院合辦「21 世紀漢語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

研究人員也利用港大校檔、歷年年報 (*Annual Report*)、紀念冊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12-1933: Souvenir*)、中文教育部告 (*Report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 Appointed to Advise o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1932*)、籌辦大學報告 (*Report of the Working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or 1927*)、華文部課程學則草案 (*Syllabus of Chinese Studies, Arts Facul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歷年大學年歷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alendar*)、報章資料，及 1912 年至 1935 年港大歷年的課程大綱，指出港大中文學院成立之初，開辦的課

程主要是應用中文，但也教導四書五經、中國歷史、中國典籍內有關政府的措施，如田賦、中央政制及歷史地理的知識，賴氏也為學生開辦國語及廣東話教學語言的科目，主要訓練學生的語言能力；研究人員更指出校方因資源缺乏，便不採用賴氏等華人要求籌辦的漢文學院（Faculty of Chinese），改為資助成立較少規模的中文學院（School of Chinese）。校方認為漢文學院主要開辦有關中文課程，花費甚大，若以中文學院的形式，可以開辦有關翻譯學科，港府最終希望中文學院的經費是自給自足。雖然，中文學院終在 1928 年開辦，但賴氏及不少中文科教員，卻不是課程委員會成員，當然他們的意見自然不被採用，賴氏等人藉中文學院推動中國文化的辦學理念受到校方政策所影響，未能全面實踐；但不可忽視，中文學院的成立開了香港高等院校開辦中國文化教育的先河，也代表了香港中國文化教育進入高等院校制度化的發展方向。最後，研究員指出 1933 年中文學院停辦、賴氏退休，隨許地山主持中文系，中文學院也自傳統經史子集的模式，邁向新學科的發展方向。

還有，研究人員利用 1930 至 1949 年大學年報（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alendar）所載中文課程及在一些「學生報」內的資料，得見中文學院在 30 年代中葉進行課程改革。其一，新一屆大學成員進入課程發展的委員會，重視傳統文化的金文泰也離開香港；其二，以推動新文化教育的學者許地山任教港大，故在傳統中國文化教育的課程上加上新的科目；其三，也可能是十分重要的因素，為港大學生很多不明白傳統的經學知識，甚至在學生籌辦的刊物上發表不滿傳統文言文教學的言論，而他們發表的短文均以白話文，可見其時港大學生一方面未能全面吸收文言文的知識，一方面也不滿文言文教學。在這眾多的因素下，港大中文系推行課程改革，教導西方研究方法，開辦宗教哲學、中國歷史、中國文學及翻譯，四大教學範疇，而這種課程規劃至今乃為港大中文系所傳承。研究人員也利用有關口述歷史及私人日記內的資料，得見陳寅恪及許地山雖看似留在港大的時間不長，但也有不少學生受兩位大師所啟導；最後，研究人員利用有關檔案及《廣東文物》的資料，介紹在抗戰時期，不少文物因避廣東戰亂，遷往港大圖書館；日後，不少明清學者的著作留在港大，此對開拓港大明清史的研究甚有貢獻。

戰後港大成立東方研究所，中文系系主任林仰山及

教員羅香林相繼南下，為了闡明在特別時空下，港大對中國文化教育的特色及貢獻。研究人員先從 50 年代，中國大陸政權易手，有些知識分子既不欲留在中國，便遷往海外及臺灣，香港成為這些知識分子暫時居住的地方，港大因為資源豐富，課程發展已日漸完備，故一方面成為南來知識分子欲任教的地方，另一方面也因港大基礎發展完備，也藉舉辦國際研討會，使香江成為中外學術文化交流的橋樑。戰後，任中文系的系主任是長於考古學的林仰山。研究員從現時港大所藏的林氏英文打印文稿、講義，得見他雖為外籍人士，卻對上古中國文化了解甚深，他也不獨在大學開辦有關科目，更在電臺演講，主持發掘李鄭屋古墓的工程，倡議成立博物館，推動了香港先秦史及考古學知識的流播；更重要的是，他改革港大中文系的課程，上承許地山的辦學規模，重訂中文科目，經史子集及翻譯各科並立，大增教員人數。他更兼任東方研究所（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主持出版學術期刊《東方文化》（*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昔日很多人認為羅氏運用英文程度不太好，自然未能在英國殖民地建立的大學內，推動中國文化教育。但研究閱讀港大馮平山圖書館藏「羅字檔」內的信函中，可見羅氏多以中文草擬課程及研究計畫，交上懂中文的林仰山，再以英文書寫，藉此實現他籌辦中文系的意見。由是可見，確立港大中文系的課程與羅、林二氏的配合，甚有關係。也因林氏的支持，中文系在 60 年代舉辦的國際漢學學術研討會，也得以成功舉行。這些國際漢學會議，在其時閉關的中國大陸，尤為難得，使未能登臨中國的臺灣及海外學者，得在香港進行學術交流。港大學生，也是香港 60 年代以還的香江第二代從事文史哲研究的學者，得以了解西方的研究成果。

談及香港在 50、60 年代，扮演了中外文化教育知識交流的角色，便不可不注意中大的成立與香港推動中國文化知識普及化的關係。我們可知中大的成立與 50 年代香港私立大專院校新亞書院、崇基書院及聯合書院的發展甚有關係。研究人員利用自 50 年代以還，新亞、崇基及聯合書院的校刊、課程大綱、大學檔案資料，已見這三所書院，在未合併之前，均多為南來學人執教之地，如錢穆、唐君毅、容啟東、謝扶雅、凌道揚等學者，他們均欲以香港為保存及傳播中外文化的地方，也藉開辦課程實踐其辦學理念。研究人員利用三間院校刊

行的刊物，如 50 年代的《新亞校刊》，60 年代至今出版的《新亞生活雙週刊》、《崇基校刊》，指出中大成立前，三院各有通識教育，由於三院背景迥異，在改組與發展過程中，三院同樣邁向學科規範化；隨著三院合併，使各自的辦學精神及理念融鑄在中大。合併後的中大，更成立中國文化研究所，固然是宏揚文化的重要學術機構，而在籌辦的中文系、歷史系、藝術系、宗教系及通識課科內的科目，均能實踐其辦學理念，當然其執行時也有不少困難的地方，研究人員尤考察中大開辦的通識教育課程與實踐中國文化教育的關係，並運用口述歷史的資料，注意合併後的三院進入大學體制內，雖一起以發揚文化教育為要務，但他們的辦學理念與維持三院聯邦制均有衝突的地方，進一步檢討合併後的中大與推動中國文化教育的關係。

我們在是次研究計畫利用的資料除中外文獻，更結合口述歷史資料。先後訪問了：香港著名學者，任教港大及中大的饒宗頤教授，主要談及港大在 50、60 年代前後林仰山在港大的角色；也訪問了新亞書院畢業生，曾任教中大哲學系的陳特教授，談及新亞精神的開拓問題；也詢問崇基畢業生陳松起夫婦，談及崇基書院在合併後，崇基的辦學精神與中大的發展問題，他們是第一對夫婦在中大崇基學院禮拜堂內舉行婚禮的；我們也訪問了港大第一位華人校長黃麗松教授，談及殖民地辦學的特色及理念；為了解中大通識教育的情況，我們訪問了籌辦中大通識教育、中大哲學系前任系主任劉述先教授，及曾任職中大哲學系的勞思光教授；為了解 20 年代遺老在香港辦學的情況，我們訪問了港大第一位中文

學院主任賴際熙教授的兒子賴恬昌教授；為了解 50、60 年代，中大推動中國文化教育的成效，我們訪問了曾就讀中大歷史系，現任浸會歷史系系主任周佳榮教授論介中大的辦學理念及實踐的情況；為求了解 20 至 60 年代香港文化界及歷史面貌，我們訪問了研究香港文學的專家、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的盧瑋鑾教授，及曾任香港大學香港史的專家學者陳明錄教授等，藉口述歷史以補充文獻不足的地方。至於蒐集的文獻方面，我們除了翻閱自 1912 年至今，港大歷年的開辦有關中國文化科的課程，大學的政令，學生刊物的資料外，也蒐集 20、30 年代太史們任教的經史講義，香港大學孔安道圖書館、中央圖書館、英國倫敦大學 Rhodes House Library 圖書館館藏港督盧押（Sir Frederick Lugard）、金文泰的資料，這些資料可以幫助了解殖民地大學成立前，英國殖民地部、英商及港英政府在香港籌辦高等院校的辦學理念及態度；也可以知道在 20 年代中葉，金文泰的政治取向及他對中國文化的嚮往，為成立中文學院的重要力量。至於有關中大的資料，研究人員已翻閱三間書院及其所屬的學生會辦的雜誌，此甚可了解 50、60 年代，香港出現中國文化熱潮、學運與高等院校教育政策的互動關係。

本研究計畫主要由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鄭培凱教授指導，研究人員包括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助理主任馬家輝博士，教員范家偉博士、屈大成博士、張為群小姐及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區志堅博士，而本研究計畫預期會於 2003 年年底完成，並把研究成果編成專書，予以出版。